

董大中
文集

鲁迅日记笺释（一九二五年）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董大中文集

鲁迅日记笺释

一九二五年

山西省作家协会◎编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董大中文集. 第1卷, 鲁迅日记笺释 / 董大中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78-5066-7

I. ①董… II. ①董…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鲁迅日记—文学研究 IV. ①C53 ②I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0496 号

书名: 董大中文集·第1卷·鲁迅日记笺释(一九二五年)
著者: 董大中

出版人: 续小强
责任编辑: 陈学清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总字数: 3190 千字

总印张: 207.75

版次: 2017 年 3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3 月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066-7

总定价: 498.00 元 (全 10 卷)

《董大中文集》编委会

主任：张明旺 杜学文

成员：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梁跃进

项目负责人：杨占平







2015年9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左一)看望作者,
阎晶明(右一)、杜学文(右二)陪同



2000年5月13日,和好友、多年在驻外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的张作楫(右)在一起



1965年7月19日,全家合影(后排右为作者)



2002年在绍兴
鲁迅故居前

大陸學者叢書 12
宋如珊·主編

魯迅

日記箋釋

一九二五年

董大中



董大中小传

董大中，一九三五年三月出生于山西省万荣县前小淮村。一九五二年在当地担任小学教师。一九五四年十月，到省教育厅教育干部训练班（今山西教育学院）学习一年，毕业后留在太原市任教，长期担任教师进修学校（今太原教育学院）教师。“文革”期间在太原市革委会和《太原报》社工作，其间，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进修班学习一年。一九七九年调进山西省作家协会，担任《汾水》（今《山西文学》）评论组长。一九八五年创办《批评家》，任主编。一九八九年底《批评家》停刊，转入省作协文学院从事专业写作。一九九五年退休。

一九五五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主要写诗。一九五八年转向文艺批评和杂文。粉碎“四人帮”以后，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艺术理论为主攻方向，重点是赵树理和高长虹的研究。二十一世纪初，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研究。

几十年间写作学术论著总计在一千三百万字以上，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分为赵树理研究系列、鲁迅研究系列、高长虹研究系列、人类学系列、古史研究系列、批评系列等。另有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剧本等，合计在百万字以上。先后出版《瓜豆集》《敲门集》《赵树理年谱》《赵树理评传》《赵树理论考》《你不知道的赵树理》《鲁迅与林语堂》《鲁迅与高长虹》《高鲁冲突》《孤云野鹤之恋——高长虹爱情诗集〈给——〉鉴赏》《董永新论》《鲁迅与山西》（合著）等著作。

自序

—

鲁迅是这样说他的《日记》的：“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元，复D信。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总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糊，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马上日记·豫序》）

许广平把鲁迅的日记分成三种，即《日记》《马上日记》和《夜记》。后两种其实是用日记形式写的记事，已归入杂文一类，真正的日记也只是鲁迅所说那一种。“据保存所得的检查一下，鲁迅先生的日记是从民国元年五月初到北京时写起的，一直没有间断。偶尔因为特别事故，如‘一·二八’战事发生，只身出走，中间经历了一个多月，待到市面稍稍平静，重回旧寓之后，他才能拿笔补记。记虽简略，但奇怪，他就有本事逐天地排列回忆起来，一些不错，看了真令人惊服的。”（《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日记》）

许广平又说：“他的日记的确写给自己看的，所以一点也不文饰。从民元到十四年的日记，离北京往厦门时并未带走，锁存北京客室里面。曾经有过一个使他不满意的客人，径自挖开锁来偷看了，事后给他晓得，可真气愤得很，足见他并非预备给人看的了，这是在他活着的时候的态度。但是假如作为从此可以看出一部分真的面目，那么这日记是最真不过的了，在研究一位在民族文化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对这是不应忽视的。况且以他自己一生的坦率，日记并没有不可告人之处，我们无须保持珍秘。但倘使说从这里可以窥知一切，那也恐怕未必尽然。”

鲁迅逝世以后，一部分《日记》在《文汇报晚刊》发表，起初读者非常多，不久之后，人们不爱看了。为什么？柯灵说：“一种是说，太简单了，跟流水账一样，枯燥得很。还有一种，问题可就大了，因为日记里所记的事情，不少是馈赠礼物，应接友朋，上馆子吃饭，进影院看戏；却并无叹穷怨命，挨打坐牢等情，生活仿佛相当优裕，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凄惨，因此对于先生的印象，恐怕反而不大好。”（《关于〈鲁迅日记〉》，《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1078页）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许广平说：“鲁迅的日记，过于简略，但也可以从这简略记载中找出不少蛛丝马迹、可资研究的东西。稍加宽泛些看来，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就像一面镜子的缩影一样地被反映出来了。”

许广平的这段话，说明了它的价值所在和对其进行研究的极端必要性。特别是“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就像一面镜子的缩影一样地被反映出来了”一句，确乎是鲁迅日记的一大特色，值得引起我们注意。许广平没有说到的是，在那极其简明扼要的“流水账”式的记事后面，跳动着主人公鲜活的生活实态。有些人的日记，写跟朋友的交往，或写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认识，抑或在某一件事情进行中自己的作为，自己的想法，具体详尽，有头有尾。像郁达夫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日记》中的一段：“晚上月亮很好，可惜人太倦了，不能出去逛，看我在过去一礼拜内所作的文字，觉得很满意，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要写它（《迷羊》）完来。”这样的日记，有景物描写，有心理刻画，宛然一篇散文。然而，其不足恰恰在于它把什么都说尽了，人们“一眼看透”，没有迷惑，没有悬念。鲁迅的日记却不是这样，它的每一笔记载，都只是一个题目，蕴藏着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去解读，就像需要

我们把那题目做成文章一样。因此，对鲁迅日记进行一番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早在五十多年前，林辰就提出，需要对鲁迅著作进行疏证。这种“流水账”式的日记更需要疏证。印象中曾经有过一本《〈鲁迅日记〉研究》，但我没有见到。包子衍的《〈鲁迅日记〉札记》是一本好书，可惜过于简略。我这本小书，是对《鲁迅日记》进行微观解读的一个尝试，从文体上说，正是林辰要求的那种“疏证”。不在论述什么，而在廓清事实，还生活本来面目，为学者们发表宏言大论做一点基础。

若能在极简单的流水账里剔出有意味的骨和肉来，作者的目的便达到了。

二

立意写这本书，在十年前。

那时我梳理高长虹和鲁迅的关系。高在《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现在我再一说《民副》事件，此关系较大，也是我视为最痛心的一事。内情鲁迅知道，素园知道，不足为外人道。是我当时看见静农态度不好，然我不愿意说出。静农去后，鲁迅也说出同样怀疑，我于是也说出。鲁迅托我次日到徐旭生处打听一下。我次日没有打听去，却又到了鲁迅家里。鲁迅又提起此事，又托我去打听。我再次日去打听时，则诚如我等所怀疑者。鲁迅当下同我商量，说要跟徐旭生去说明真相。我说：‘为思想计，则多一刊物总比少一刊物好，为刊物计则素园编辑总比孙伏园好，其他都可牺牲。’鲁迅说：‘只是态度太不好——但那样又近于破坏了！’于是鲁迅没有写信，而《民副》产生。这些本来与我无关，无须多管闲事。但不料此后我再见徐旭生时，则看我为贼人矣！此真令我叹中国民族之心死也！不料不久以后则鲁迅亦以我为太好管闲事矣！此真令我叹中国民族之心死也！”这段话中“不足为外人道”者，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中有所透露：“……于是由某君出面，要求先生写介绍信，同时又找正在办《猛进》的北大教授徐旭生先生亦写介绍信。可是，某君的话，是两样讲法。他对徐旭生先生说：是鲁迅先生要求徐旭生介绍韦素园去编副刊；而对鲁迅先生则说：是国民党方面要求先生介绍一位副刊编辑去。总之：两方面都写了介绍

信去，事情算是成功了，便由素园出面去编辑，鲁迅先生还代他各方面拉稿，后来不知道怎样一弄，鲁迅先生知道了某君两样话语，竟非常之生气，说：‘你看，他竟到我这里玩手段来了。’”

两人不约而同写到这件事，使我们知道荆有麟笔下的“某君”便是台静农，高长虹没有说出的话，乃是台静农在鲁迅和徐旭生面前是“两样讲法”。这反证了两人回忆的真实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得到验证，就是高长虹说鲁迅“托我去打听”一节，是否能够得到《日记》的支持。我由此想到，《鲁迅日记》虽然写得简略，却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应该把它的记载大体搞清：今天谁来，是因为什么，谈了些什么话；明天得到谁的信，有什么事，鲁迅复信又谈了些什么——鲁迅的复信，少数留下来了，大多数早已散失；还有诸如应邀赴宴却“一赴即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等等。也许，唯其简略，才有弄清的必要吧。

那又为什么选择一九二五这一年呢？这却跟高长虹和鲁迅的关系不大了，或者说，这仅仅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我在《鲁迅与高长虹》一书第二章的开头说道：“一九二五年，在鲁迅的生命史上，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年。这一年，已经爆发一个多月的女师大事件，迅速发展、升温，持续好长时间，到夏天达于顶点，进步师生搬出学校，赁屋授课，而学校当局及其背后以章士钊为总长的教育部，也采取了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停办女师大、成立女子大学等措施，进行对抗。在这一场公理与强权的较量中，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跟章士钊、杨荫榆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女师大事件展开了鲁迅终生跟强权进行不懈抗争的光辉篇章。这一年，鲁迅在他的感情生活中，经过了最美、最真挚、最有意义的一段历程，并且让我们直言不讳地说，这也是一个鲁迅在是要生活上的助手还是要事业上的战友的两难处境中做出选择的时刻，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初步形成了他跟许广平相濡以沫、共扶艰危的人生关系，理顺了生活程序，为创造他生命最后十年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年，从鲁迅的内心世界说，又是他由‘五四’时期的大声呐喊，坠入‘荷戟独彷徨’的苦闷，却又不甘于苦闷、彷徨，不得不‘上下求索’、努力寻求新的生路的一个时期。终于，他以写出表现他生命哲学的散文诗《野草》为标志，确立了面向现实、完成理想的人生方向。除了公理与强权、事业与生活、理想与现实这三组矛

盾以外，这一年，在鲁迅心灵空间占据着很大位置的，还有一个如何团结更多的人，通过开展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以更好更有力地跟旧势力进行战斗的问题。为此，他着重抓了舆论阵地的建设和‘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两件大事，《莽原》的创办就是完成这个任务的一项具体措施。”总而言之，这一年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是鲁迅把攻击的矛头由历史转向现实的一年，是鲁迅构筑他精神家园的一年，总之，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年。我这个想法是逐渐形成的，到十年前梳理鲁迅与高长虹的关系时，跟前一个想法不期而遇，于是想到写这么一本书。

三

书写完了，现在回头看，我深深感到，选择从日记上解读鲁迅，还真弄对了。我们曾经读过不少人的日记，但那些日记在写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将在某个时候公之于众，或者甚至是为发表而写作，至少要“留彼将来”，这样写什么不写什么就有了很大的选择性。鲁迅的日记，正如许广平所强调的那样，是只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有人偷看了他的日记，被他晓得后，“真是气愤得很”。许广平说，这日记“是最真不过了”。柯灵说：“《鲁迅日记》的价值，是在于它的老实，没有造作，不加装点，读者闭目一想，眼前现出来的是一个作家的老老实实的生活。”（《关于〈鲁迅日记〉》）的确如此。过去许多年我们所读到的鲁迅，被太多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所涂抹，失去了真实面目，这本日记却使我们向鲁迅走近了一大步。我们看到的是“最真不过”的鲁迅。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心灵，看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我们看到的鲁迅，是一个平民化的鲁迅，是一个伟大被平凡所掩盖的鲁迅，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形态和党派观念所侵蚀的鲁迅。也可以说，日记中所显示的是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情景，他处在日常生活中，又被彻底生活化了。

书写完了，现在回头看，选择这一年还真选对了。

这一年的鲁迅，有喜，有怒，有哀，有乐；有领着老母游钓鱼台，有跟几个女孩子在家聚餐；有严肃的笔战，有跟老友“之乎者也”的嬉笑；有组成“联合战线”的喜悦，也有些小烦恼……

这一年的鲁迅，至少有过两次大醉，一次是跟几个青年文学家筹办《莽原》，一次是跟几个女孩子共庆端午。我们可以想象，当醉了的鲁迅用拳打俞芬姐妹、用手按住许广平的头的时候，那是怎样可爱的一个真我啊！这次大醉《日记》未记，但在给许广平信中提到。那是辩解，辩解中透出几许天真。在上海一次大醉时，高举拳头，大叫着“还有谁要决斗”，这情景虽然没有提前出现，但那高举的拳头，不正是一个人的人生符码吗？

这一年的鲁迅，有过把一个神经病患者当作朋友直谈到半夜的故事，有跟柯仲平第一次见面就听柯发疯一样朗诵自己诗作的雅兴，有把另一位笔名以鲁为姓的作家称为“吾家鲁彦”的趣事，而鲁彦来到“老虎尾巴”又总是倒头便睡、拿烟就抽，异常随便。

这一年的鲁迅，第一次运用法律手段，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送到了“平政院”的审判台上，最后取得了胜利。

这一年，鲁迅基本完成了他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彷徨》和极具哲理意味的散文诗《野草》的写作，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把杂文用于现实斗争之中，写于这一年的《灯下漫笔》《春末闲谈》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也成为这一新兴文体的典范作品。李长之就说，鲁迅的杂文到这一年（原说1925年、1926年）风格已经确定。

这一年的鲁迅，有他跟许广平最美好的恋爱，有他们第一次接吻……“情”在他的心中生长。

有人喜欢后期的鲁迅，我却喜欢这一时期的鲁迅，特别是这一年的鲁迅。这一年鲁迅的生活，不仅是美好的，而且也是丰富多彩的。这一年的鲁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毫无遮掩、毫不造作的真我。过去许多年，人们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总主题、总路线出发，突出宣传鲁迅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强调要像鲁迅打“落水狗”一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敌人毫不手软。一直到近些年来，鲁迅如何同敌人斗争，如何“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仍然是出版社和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同样题目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以致留给人们一个印象，鲁迅是个只会打人的人，他信奉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所做的一切是跟人相斗。这远不是鲁迅的全面。如果说鲁迅在文字上显示出一种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有时显得如一些人说，对人有点“刻薄”，那么就鲁迅处人来说，却是异常厚道的。他不臧否

人物，不谈政治，不涉“当局”（这是这本日记跟胡适等人日记很不相同的一点）。从这本日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外部世界，我们看到的只是日记主人的小宇宙、小天地。素昧平生的青年，写信来提出一些问题或要求，或寄稿来请求设法发表，鲁迅都当作亲友一般看待，认真写信回答。稿件无处发表时，负责退回，有了刊物后，能发表的及时发表出来。尚钺算是《莽原》同人，但他却在信上指斥另一些同人，鲁迅收到来信后，既不生气，也不偏听偏信，依然热情对待双方。就是那个曾引鲁迅生气，认为是把自己“玩”了一下的人，鲁迅后来也一直当好朋友看待，从未表现过不满。《两地书》一一二信说：“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这不是自我粉饰，乃是实际情况。生活中的鲁迅是厚道的，也是真诚而且有时有点天真的。这一年的鲁迅，不仅令人可敬，也令人喜爱。我们既应当尊敬鲁迅，也应当热爱鲁迅，像生活中的那些人一样把鲁迅当作自己的朋友。

让鲁迅回到生活之中，显出真我，乃是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四

鲁迅思想的发展，这一年似乎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是很值得研究的。

本文略述以下几点。

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从清末以来，人们就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行反思，并做出各自的阐释。五四运动中，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归结到一点，是向封建君主专制这个“传统”开火，要彻底粉碎它，跟它告别，代之以民主和科学。那以后，人们曾用多种“模式”形容、概括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李四光把中国历史分作每八百年一个由统一而分裂、由强而弱的段落，周而复始地循环，从秦至清，已有三个周期。对这个“模式”，林语堂甚为赞成。其实它没有说出中国历史的实质。鲁迅在发表于《莽原》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中所做概括，是那样深刻，一下击中要害。他用“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概括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两个时代的循环。其所以这样，

又基于历代封建君主把天下当私有财产，“把人不当人”，对广大人民实施极其严酷的精神统治，使人们都像被细腰蜂叮过一样，成了没有思想的工具。他把人和人的地位放到观察历史、观察社会的核心。这是他多年来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的总结，既为他一系列小说的形象描写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他今后跟旧势力进行斗争打下了基础。这两篇文章系《莽原》初办时所写，具有沉甸甸的力量，奠定了该刊的基本方向。

中西文化比较：《青年必读书》写于年初，后又写了几篇论辩文章，它们较清晰地表现了鲁迅的中西文化观和“行”的哲学。鲁迅反对坐而论道，重视实行，西方文化正是要人行，不是要人说，更不是要人唱高调。东西文化实际是过时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另一种说法，中国人的毛病正在于迷恋过时的文化，不能与时俱进。在东西文化的大方向上，鲁迅的思想跟陈独秀、胡适等人是一致的，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胡适等提倡“西化”，主要是把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移植过来，即用民主代替、改造我们的专制主义。鲁迅对西方的议会民主那一套并没有真正认同，这导致两人后来的分道扬镳。但认为西方现代文化优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传统和中国人的愚昧和落后只有靠人类现代文化才可以医治，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该“拿来”的就“拿来”，却是正确的，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第三样时代的渴望和设想：在《灯下漫笔》里，鲁迅响亮地提出：“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又说：“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第三样时代”系针对“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两个时代而言。它不像胡适等人追求的民主政治那么清楚明白，但其主旨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跟那两个时代不存在相同之处，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没有奴隶也没有主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就被说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鲁迅本年开始大量阅读苏联文艺理论书籍，以后越来越喜欢苏联，实际上把苏联当成他所期望的第三样时代的样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苏联为师的，是继苏联以后人类所进行的另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她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鲁迅看来，跟新生的苏维埃一样，正是自己所期望、所憧憬的第三样时代。